

内部交流

研究与参考

2014年第十一期（总第41期）

基辛格新著《世界秩序》摘录及评论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SHANGHAI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基辛格新著《世界秩序》摘录及评论

编者按：

美国著名学者、政治家基辛格日前新出版著作《世界秩序》。基辛格在新著中将历史上的世界秩序分成了欧洲、伊斯兰国、中国、美国四类,并探讨了这四类世界秩序是如何演化的,他们是如何形成自己各自的历史?当不同的世界秩序相遇时,发生了什么?不同时期,他们如何平衡正义与权力?这四类秩序在当今世界现状如何,他们将如何塑造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鉴于此书在国内还没有译本,我所汇集相关文章制成新书摘录与外媒评论合辑,供有关研究人员参考。

【书籍摘录】 该书引言及结束语部分如下：

引言

世界秩序问题

1961年,我在堪萨斯城发表演讲,随后在那里拜访了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当时我还是年轻的学者。我给杜鲁门提出的问题是,在他总统任期间,让他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说:“我们彻底打败了我们的敌人,然后让他们回到国际社会。我想,只有美国会做到这一点。”杜鲁门意识到美国的巨大力量,尤其对美国的人道和民主价值观感到自豪。他希望让人们铭记的不是他执政期间美国取得的胜利,而是美国进行的调解。

杜鲁门之后的各届总统都在某种程度上仿效这样的叙事,并为美国经验的类似特点感到自豪。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他们旨在支持的国际社会反映了美国的共识——建立一种不断扩大的合作秩序,让各国遵守共同的规则和规范,接受自由经济体系,坚决放弃领土征服,尊重国家主权,采取参与性民主治理制度。两个政党的美国总统常常以极大的热情和说服力继续促请其他国家政府保护和加强人权。在许多情况下,美国及其盟国对这些价值观的捍卫给改善人类境况带来重要机会。

然而,这个“基于规则的”体系现在面临着挑战。我们经常告诫各国“尽职尽责”,遵守“21世纪的规则”或者成为一个共同体系的“利益攸关方”。这表明,该体系没有一个共同的定义,或者没有对什么是“公平的”贡献达成谅解。在西方世界以外,曾在这些规则的最初制定中发挥最小作用的地区质疑这些规则的目前形式的有效性,并且明确表示他们将努力进行修改。虽然“国际社会”一词比以往任何其他时代都被更加持之以恒地引用,但是它没有一套明确的或商定的目标、方法或限制。

我们时代正在持之以恒地,有时几乎绝望地追求一种世界秩序概念。混乱构成威胁,相互依赖同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国家的解体、环境破坏的影响、种族灭绝行径的持续以及新技术的传播,这一切有可能使冲突超出人类的控制或理解的程度。获取和交流信息的新方法使一些地区实现前所未有的联合,把各种事件传播到全球——但是采取的方式不容反思,要求领导人以易于表述的口号形式作出瞬间反应。我们是在面对一个由任何秩序都无法约束的力量决定未来的时期吗?

不同的世界秩序

从来没有真正的全球性“世界秩序”。我们时代经历的秩序是将近 400 年前在德国威斯特伐利亚举行的一次和平会议上确定的。当时,多数国家或者文明没有参加那次会议,甚至都不知晓。中欧地区持续一个世纪的教派冲突和政治动荡导致 1618 年至 1648 年的 30 年战争。

在那场战火中,政治和宗教纠纷交织在一起,交战人员对人口中心发动“全面战争”,中欧地区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于战斗、疾病或饥饿。精疲力竭的参战国开会作出一系列制止流血的安排。宗教四分五裂,新教得以生存和蔓延;若干不分胜负的政治团体存在固有的政治多样性。因此,当代欧洲的情况近似:那里存在多种多样的政治团体,没有一个强大得足以战胜所有其他政治团体,许多政治团体恪守矛盾的哲学和内部惯例,寻找中立的规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并减轻冲突。

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反映了对现实的实际适应,而不是独特的道德见解。它依靠独立国家避免彼此干预内政并通过总体力量平衡彼此制约对方野心的制度。在欧洲的竞争中,没有一种有关真理的断言或通用规则占上风。相反,每个国家都对其领土享有主权。每一个国家都承认别国的国内结构和宗教职业为现实,并避免挑战它们的存在。凭借现在被视为自然和可取的力量平衡,统治者的野心将被彼

此制约,至少从理论上限制冲突的范围。分裂和多样性是欧洲历史的意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有自己的独特哲学观的新国际秩序体系的标志。从这个意义说,欧洲当时结束其战火的努力塑造和预示了现代敏感性:它保留了对绝对事物的判断,主张实用和普世;它寻求通过多样性和克制建立秩序。

拟定《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议》的17世纪谈判代表并不认为他们当时在为一个全球适用的体系奠定基础。他们并没有尝试囊括邻近的俄罗斯。当时,在经过噩梦般的“动荡时代”之后,俄罗斯正在重建自己的秩序,采取与威斯特伐利亚平衡明显格格不入的原则:单一的绝对统治者、统一的宗教正统观念以及向四面八方扩张领土的计划。其他主要力量中心也没有认为威斯特伐利亚解决办法(在它们知道的情况下)与自己的地区相关。

世界秩序理念适用于当时的政治家所知道的地理范围——这是一种在其他地区废除的模式,主要是因为当时流行的技术不支持,甚至不允许一个单一全球体系的运作。由于没有进行持续互动的手段,也没有用一个地区的力量衡量另一个地区的力量框架,每个地区都把自己的秩序视为独特的秩序,把其他人视为“野蛮人”——这些人的统治方式令老体系无法理解,并且与其意图无关,只是一种威胁。每个地区都把自己视为全人类合法组织的模板,设想将在治理眼前局面的过程中确定世界秩序。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中国是等级森严和理论上通用的秩序概念的中心。这个体系已经实施了几千年。当罗马帝国统治整个欧洲时,这个体系已经存在,它的基础不是国家主权平等,而是假定皇帝的统治范围没有边界。根据这一概念,欧洲意义的主权并不存在,因为皇帝统治着“天下”。他处在一个政治和文化等级制度的顶点,这个与众不同而又普遍适用的制度从中国首都的世界中心向外面的所有人类辐射。后者被归类为不同程度的野蛮人,这部分取决于他们掌握中文写作和

文化习俗(延续到现代的宇宙学)的程度。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决定世界秩序的主要途径是以其辉煌的文化和经济恩惠让其他社会敬畏,与它们建立关系,设法达到“天下和谐”的目标。

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大部分地区,伊斯兰教的不同世界秩序概念占统治地位,以其自己的单一神圣治理设想团结并安抚世界。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以空前的宗教狂热和帝国扩张浪潮席卷三个大陆。伊斯兰教先后统一阿拉伯世界,接管罗马帝国的残余领土,吸纳波斯帝国,随后开始统治中东、北非地区、亚洲大片地区和欧洲部分地区。其版本的全球秩序认为,伊斯兰教注定要向“战争疆界”(这是对非信徒居住区的称谓)扩张,直到整个世界成为靠先知穆罕默德的讯息实现和谐的单一体系。由于欧洲建立了多国秩序,以土耳其为基础的奥斯曼帝国重新提出实施单一合法治理的主张,并将其霸权扩展到阿拉伯腹地、地中海、巴尔干地区和东欧国家。它意识到欧洲的新生国际秩序;它认为这不是一个模式,而是一个可被利用的分裂根源,让奥斯曼帝国向西扩张。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对实施15世纪的早期多元化版本的意大利城邦告诫说:“你们是20个国家……你们中间有分歧。世界上必须只有一个帝国、一种宗教和一个主权。”

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一种鲜明的世界秩序设想正在“新大陆”奠定基础。在17世纪,当欧洲的政治和宗派冲突肆虐时,清教徒着手以一项“旷野中的使命”落实上帝的计划,这让他们免于遵守既定的(在他们看来是腐败的)权力结构。正如约翰·温斯洛普总督在1630年乘船前往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时所宣扬的那样,他们将在那里建设一座“山巅之城”,通过其原则的公正及其力量的榜样激励全世界。按照美国关于世界秩序的观点,和平与平衡会自然发生,古代的敌意会被放在一边——一旦其他国家像美国人一样在本国的治理中获得相同的原则性发言权。因此,外交政策的任务与其说是追求特定的美国利益,不如说是制定共同的原则。

美国迟早会成为欧洲设计的秩序的不可或缺的捍卫者。然而,正当美国支持这一努力的同时,一种矛盾心理难以消除——美国的设想不是取决于接受欧洲的力量平衡体系,而是取决于通过传播民主原则实现和平。

在所有这些秩序概念当中,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在撰写本文时是世界秩序存在的唯一公认的基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全世界传播,成为一种以国家为基础的跨越多个文明和地区的国际秩序的框架,因为随着欧洲国家的扩张,它们带着它们的国际秩序蓝图。虽然它们经常忽略对殖民地和殖民地人民应用主权概念(此时这些殖民地的人民开始要求独立),但是它们以威斯特伐利亚概念的名义这样做。事实证明,在后来争取独立和保护新生国家的斗争中,国家独立、主权国家地位、国家利益和干涉内政等原则是反对殖民者的有效论据。

当代的、也就是现在的全球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俗称“国际社会”),以广泛的国际法律和组织结构网络遏制世界的无政府性质,这些组织结构的目的是促进开放的贸易和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制定解决国际争端的公认原则,在战争爆发后规定战争行为的限度。这种国家体系现在涵盖每一个文化和区域。其机构为不同社会的互动提供了中立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各自的价值观。

然而,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受到全面的质疑,质疑者有时以世界秩序本身的名义。欧洲已开始背离它设计的国家体系,并通过一个联合主权概念超越这个体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欧洲发明了力量平衡的概念,它还是有意识地并且严格地限制其新机构中的力量元素。由于其军事能力已经降级,当普遍规范受到蔑视时,欧洲几乎没有应对余地。

在中东,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伊斯兰圣战主义者分裂社会,毁灭国家,寻求基于其宗教的原教旨主义版本的全球革命愿景。国家本身以及基于国家的区域体系危在旦夕,受一些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民兵的攻击。这些意识形态认为国家的制约

非法。在几个国家,民兵的力量比政府的武装部队强大。

亚洲在某些方面是采取主权国家地位概念的最成功地区,现在仍然对替代的秩序概念有怀旧之情,并为曾在 100 年前毁灭欧洲秩序的那种对抗和历史要求感到心神不安。几乎每一个国家都认为自己正在“崛起”,把分歧推向对抗的边缘。

美国举棋不定,时而捍卫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而谴责力量平衡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前提不道德并且过时。它继续断言其价值观在建立和平的世界秩序方面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并保留在全球支持这些价值观的权利。然而,美国在两代人的时间退出三场战争,每一场开始都有理想化的愿望并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但最终给全国造成创伤,如今美国在设法定义它的力量(仍然庞大)与其原则之间的关系。

所有主要力量中心都在某种程度上实践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元素,但没有一个力量中心认为自己是该体系的自然捍卫者。所有力量中心内部都在经历重大变化。有着如此不同的文化、历史和传统秩序理论的地区能够证明任何共同体系的合法性吗?

这种努力的成功将需要采取一种方针,既尊重人类境况的多样性,又尊重人类对自由的根深蒂固追求。这个意义上的秩序必须加以栽培,而不能强加,在即时通讯和革命政治变动时代,这一点尤其如此。任何世界秩序体系,要想持续下去,就必须被接受为公正的体系,不光得到领导人的接受,还要得到公民的接受。它必须反映两个真理没有自由的秩序,即使靠一时的兴奋维持,最终也会形成自己的平衡;然而,如果没有维持和平的秩序框架,就不能获得或维持自由。秩序与自由,有时被描述为“经验光谱”(spectrum of experience)的两极,应当被理解为相互依存。今天的领导人能够超越紧迫的日常事件,实现这种平衡吗?

合法性与力量

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涉及三个层面的秩序。世界秩序描述的是一个地区或文

明持有的关于公正安排的性质以及被认为适用于整个世界的力量分配的概念。国际秩序是这些概念对全球很大一个地区——大得足以影响全球力量平衡——的实际应用。区域秩序涉及应用到一个特定地理区域的相同原则。

这些秩序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体系都基于两个组成部分：一套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和一种力量平衡。被普遍接受的规则界定允许的行为的限度，而力量平衡在规则失效时施加约束，防止一个政治团体征服所有其他团体。在现有安排的合法性上形成的共识，现在或过去都不能阻止竞争或对抗，但它有助于确保通过竞争或对抗调整现有秩序，而不是对它构成基本挑战。均势本身并不确保和平，但如果经过深思熟虑地构建和应用，它可限制根本性挑战的范围和次数，并减少这些挑战在发生之后成功的机会。

任何一本书都不能涵盖有关国际秩序的每一项历史方针或者现在积极塑造世界事务的每一个国家。本书尝试描写其秩序概念对现代的演变影响最大的地区。

合法性和力量之间的平衡极其复杂；它所适用的地理区域越小，该区域内的文化信念越一致，就越容易形成有效的共识。但在现代世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由于历史或价值观而彼此无关的一系列实体（除非保持一定的距离），基本上根据自己能力的限度给自己下定义，它们很可能产生冲突，而不是秩序。

1971年，在美国和中国经过20年的敌对之后，我第一次访问北京，重建与中国的联系，当时我对美国代表团说，中国是“神秘的土地”。周恩来总理回答说：“你会发现它不神秘。当你熟悉它的时候，它就不会像以前那样神秘了。”他说，中国有9亿人，这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正常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世界秩序的追求将需要把其现实基本上自成格局的社会的看法联系在一起。有待克服的神秘感是一个所有人民的共同神秘感——那就是如何把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塑造成一个

共同的秩序。

结束语

我们时代的世界秩序是什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国际社会的归属感似乎即将产生。世界工业先进地区在战争中精疲力尽，经济欠发达地区已开始它们的非殖民化进程，并重新确定它们的特性。所有国家都需要合作，而不是对抗。美国没有受到战争的蹂躏，实际上其经济和国民信心却因为战争而得到加强，因此开始实施它认为适用于整个世界的理想和惯例。

当美国开始拿起国际领导者的火炬时，它给世界秩序的追求增加了一个新的方面。作为一个显然以自由和代议制思想为基础的国家，它认为自己的崛起与自由和民主的传播息息相关，还认为这些力量能够给全世界带来迄今一直未能实现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欧洲的传统秩序观念认为，民众和国家是固有的竞争对手；它依靠力量平衡和开明政治家的同心协力，限制民众的对立野心的影响。

美国的普遍观点认为，人有天生的理性，并且倾向于和平妥协、常识和公平交易；因此，民主的传播是国际秩序的首要目标。自由市场会提升个人，丰富社会，以经济相互依存取代传统的国际竞争。按照这种观点，冷战的原因是共产主义的畸变；苏联迟早会回到国际社会。然后，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将涵盖全球所有区域；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会使国家内的情况更具人性化，并使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降低。

建立世界秩序是多代人的事业，在很多方面已经取得成效。它的成功表现在许多独立的主权国家治理世界上的绝大部分领土。民主和参与性治理的传播，即使没有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也成为共同的愿望；全球性通信和金融网络实时运行，使人类互动的规模超出前辈的想象；解决环境问题的共同努力，或者至少作

出这种努力的动力已经存在；国际科研、医疗和慈善社会的注意力集中于疾病和健康灾祸，以前这曾被视为对命运的难以克服的蹂躏。

美国对这种演变作出了重大贡献。美国的军事力量为世界其他地方提供了安全屏障，不管其受益者请求与否都是如此。在基本单方面的美国军事保证的保护下，发达世界的大部分国家结成一个联盟体系；发展中国家得到保护，免遭它们有时没有认识到的，甚至更少承认的威胁。全球经济得以发展，美国为之贡献了资金、市场和大量的创新。或许从 1948 年到世纪之交是人类历史上出现早期全球性世界秩序的一个瞬间，它是美国理想主义和传统力量平衡概念的混合产物。

然而，正是它的成功使整个事业最终受到质疑不可避免，质疑者有时以世界秩序本身的名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普遍意义源自其程序性——也就说价值中立性。其规则适用于任何国家：不干涉别国内政、边界不可侵犯、国家主权、国际法律的激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既有弱点又有优点。它由在战争中筋疲力尽的国家设计，并没有提供一种方向感。它涉及的是分配和保持力量的方法，它没有解决如何产生合法性的问题。

在建立一个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一个关键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其统一原则的实质内容。这些原则体现西方和非西方的秩序观念的基本区别。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一直深深地致力于这种看法：现实世界只能让观察家看到外表，知识由数据的记录和分类构成——越准确越好，外交政策的成功取决于评估现有的现实和趋势。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是对现实的判断——特别是力量和领土的现实，这是世俗的秩序建立概念，而无视宗教的要求。

在其他伟大的当代文明中，现实的孕育可让观察家看到内部，由心理学、哲学或宗教信仰予以界定。儒家思想按照中国文化的近似法界定的等级制度把世界分成附庸国。伊斯兰教把世界分成一个世界和平，即伊斯兰教的世界和一个战争的

世界,即非信徒居住的世界。因此,中国认为无需走出国门去发现它认为已经有序的世界,或者通过内部道德修养建立秩序最好的世界,而伊斯兰教只能通过征服或全球传教从理论上建立世界秩序,因为其客观条件并不存在。印度教发现历史周期和超越世俗经验的形而上学的现实,把它的信仰世界视为一个无论通过征服还是通过皈依都不对新来者开放的完整体系。

这种同样的区别涉及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西方在掌握经验现实方面得到满足,对世界上的遥远地方进行探索,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他传统文明各自认为自己是世界秩序的中心,没有同样的推动力,在技术上落后。

这一时期现已结束。世界其他地区正在追求科学技术,还因为它们不受既定模式的妨碍,或许其精力和灵活性多于西方,至少在中国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如此。

在地缘政治世界,西方国家建立并宣布为全球适用的秩序现在处于转折点。其秘方得到全球的理解,但是就其用途尚无共识;实际上,人们对民主、人权和国际法等概念进行不同的解释,交战各方经常援引这些概念作为战斗的口号相互攻击。这个体系的规则已经颁布,但事实证明毫无作用,因为缺乏积极的实施。有关伙伴关系和社区的保证在一些地区被更加明智的极限测试取代,或者至少被其伴随。

据认为,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由西方的各种警告和惯例以及爆炸性区域秩序、教派冲突、恐怖主义和不分胜负的战争造成,或者至少得到其支持,因此使冷战后时代的这些乐观假设受到质疑:民主和自由市场的传播会自动创建一个公正、和平和包容的世界。

世界上几个地区已经出现抵消性的动力,形成反对发达世界的危机诱发政策的堡垒,其中包括全球化的某些方面。曾作为基本假设的安全承诺受到质疑,有

时,质疑者恰恰是这些承诺寻求保护的国家。在西方国家大幅减少其核武库,或在
其战略理论中降低核武器的作用的时候,所谓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却以巨大的能量
寻求这些武器。一些政府曾经接受美国对其世界秩序版本的承诺(甚至偶尔为之
困惑),现在开始询问这样的承诺是否导致美国最终没有足够耐心确保其善始善
终。按照这种观点,接受西方的世界秩序“规则”夹杂着不可预知的责任因素——
这种解释促使一些传统的盟国与美国明显分离。实际上,一些地方藐视全球规范
(如人权、法定诉讼程序或男女平等),认为这是明显的北大西洋偏好,此举被视为
一种积极的美德和替代价值体系的核心。更加基本的身份形式被视为排斥性势力
范围的基础。

结果根本不是力量的多极化,而是充满日益矛盾的现实的世界。我们不能假
定,如果对这些趋势置之不理,它们会在某一时刻自动适应一个平衡与合作,甚至
有一些秩序的世界。

国际秩序的演变

每一种国际秩序肯定迟早会面对质疑其凝聚力的两种倾向的影响:要么重新
界定合法性,要么力量平衡发生重大转变。第一种趋势在支持国际安排的价值观
发生根本变化时出现——这些价值观被负责维持它们的人放弃或者被革命推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合法性概念。这是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许多传统
秩序的影响,是伊斯兰教在七世纪和八世纪的初步扩张浪潮中造成的影响,是 18
世纪的法国革命对欧洲外交的影响,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极权主义在 20 世纪的影
响,是我们时代发生的对中东地区脆弱国家的伊斯兰主义攻击造成的影响。

这种剧变的实质是,虽然它们通常以武力为基础,但其压倒一切的推力是心理
上的。那些受到袭击的人面临着挑战,不仅需要捍卫他们的领土,还需要捍卫他们
生活方式的基本设想,捍卫其存在的道义权利,并以在受到挑战之前毋庸置疑的方

式采取行动。自然倾向,尤其是多元化社会领导人的自然倾向,是与革命的代表接触,期望他们的真正要求是进行真诚的谈判,商讨现有秩序的前提,并达成合理的解决办法。这种秩序不是主要来自军事失败或资源不平衡(尽管这种情况常常随之发生),而是来自未能理解对其挑战的性质和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伊朗核谈判的最终考验是,伊朗愿意通过谈判解决核问题的表示是一个战略变化,还是寻求长期占优势的政策战术手段,以及西方是否把这种战术手段当作战略性的方向转变。

一种国际秩序发生危机的第二个原因是它无法适应力量关系的重大变化。在某些情况下,该秩序崩溃的原因是,它的主要成分之一停止发挥其作用,或不复存在——正如临近 20 世纪末苏联解体时共产主义国际秩序发生的情况。或者,一个崛起的大国可能拒绝扮演它没有参与设计的一个体系分配给它的角色,而老牌强国可能无法适应整个体系的平衡来接纳它的崛起。德国的崛起在 20 世纪给欧洲的体系构成这样一种挑战,触发两次灾难性战争,欧洲从未完全恢复。中国的崛起在 21 世纪构成类似的结构挑战。21 世纪的主要竞争者是美国和中国,两国的总统(主席)誓言通过一种“新型大国关系”避免欧洲的悲剧重演。这一概念需要共同详尽阐述。它可能是这两个或其中一个大国作为一种战术策略提出的。尽管如此,它仍是避免重复以往悲剧的唯一道路。

在秩序的两个方面——力量与合法性——之间保持平衡是政治家才能的实质。没有考虑道德方面的力量计算会使每一种分歧变成变实力测试;野心没有止境;国家会被迫采取不可持续的绝技,对不断变化的力量配置作出难以捉摸的估计。另一方面,不顾及平衡的道德排斥往往引发圣战,或者由于一项政策而诱发挑战;任何一个极端都有可能危及国际秩序本身的一致性。

在我们的时代,部分由于第 9 章讨论的技术原因,力量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化之

中,而有关合法性的主张,其范围每十年以迄今为止无法想象的方式成倍扩大。如果武器能够抹杀文明,价值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瞬间发生并出现空前的侵入性,保持力量平衡或价值社会的既定估计就可能变得过时。

随着这些不平衡的加剧,21世纪世界秩序的结构在四个重要方面显得不足。

第一,国家本身是国际生活的基本正式单位,国家的性质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国家受到蓄意的攻击和废除,在一些地区由于忽视而被侵蚀,常常被一系列的事件淹没。欧洲已经着手超越国家,制定主要基于软实力和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外交政策。但是,与任何战略概念分离的合法性主张能否维持一种世界秩序还是可疑的。

欧洲还不具备国家地位的特性,有可能在内部引发权力真空,在其边界一带造成力量失衡。中东的部分地区已经分解成彼此交战的宗派区和种族区;宗教民兵和支持他们的力量随心所欲地侵犯边界和主权。亚洲的挑战与欧洲的相反。威斯特伐利亚权力平衡原则在那里盛行,与一种商定的合法性概念无关。

冷战结束以来,我们在世界几个地区目睹了“失败国家”、“无人管制地区”的现象,或者一些几乎称不上国家的国家没有垄断武力的使用或者没有有效的中央权力。如果大国开始奉行的外交政策是操纵许多遵守含糊不清而且常常暴力的行为准则的次主权地区,无政府状态肯定会出现,因为许多这样的行为准则基于对不同文化经历的极端阐述。

第二,全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彼此意见不和。国际经济体系已经成为全球性体系,而世界政治结构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全球的经济动力是消除货物和资本流动的障碍。国际政治体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有关世界秩序的不同想法以及国家利益概念的协调一致。经济的全球化实质上忽略了国界。国际政策强调边界的重要性,同时试图调和冲突的国家目标。

这种动力产生了几十年的持续经济增长,同时伴随着看似不断升级的周期性

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2001年的美国金融以及2007年美国再次爆发的金融危机、2010年后欧洲的金融危机。赢家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度过难关,并向前发展,因此对该体系几乎没有保留意见。但输家是那些被困在结构性错误设计中的地区——欧洲联盟南部就是这种情况。它们通过否定或者至少妨碍全球经济体系运作的解决方案寻求补救办法。

虽然每一场危机都有不同的原因,但它们的共同特点一直是肆意的揣测和系统性的风险低估。已经发明的金融工具可使有关交易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债权人发现难以估计他们承诺的程度,包括主要国家在内的债务人很难理解其负债的影响。

因此,国际秩序面临着一个矛盾:它的繁荣依赖于全球化的成功,但这个进程产生一种常常与其愿望背道而驰的政治反应。全球化的经济管理人员几乎没有机会参与政治进程。政治进程的管理人员几乎没有动力拿自己的国内支持率冒险,去预测经济或金融问题,这些问题错综复杂,除专家以外,任何人都不能理解。

在这些条件下,我们面临的挑战变成治理本身。政府受到压力,不得不寻求使全球化的进程朝着国家取得优势或重商主义的方向发展。在西方,全球化问题与民主外交政策的执行问题合在一起。协调政治和经济的国际秩序对既定观点构成挑战:寻求世界秩序是因为它需要扩大国家框架;制定全球化纪律是因为可持续的惯例意味着修改常规模式。

第三是缺乏大国在最重要问题上磋商并且可能进行合作的有效机制。这种批评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因为现在有许多多边论坛——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令人信服的正式权威机构,但是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僵持不下,此外还有北约和欧盟的大西洋领导人定期峰会、亚太地区领导人出席的亚太经合

组织会议、东亚峰会、发达国家的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会议以及主要经济体的 20 国集团峰会。美国是所有这些论坛的关键参与者。然而,这些会议的性质和次数不利于拟订长期战略。时间表的讨论和正式议程的谈判占用绝大多数部分筹备时间;一些论坛实际上与领导人的日程重叠,因为很难定期把领导人召集到一个地方开会。从其地位的性质上说,与会国家元首专注于他们在会议上的行动的公开影响。他们很想强调战术上的影响或公共关系方面。这个过程只允许设计一份正式的公报,在最好的情况下讨论悬而未决的战术问题,在最坏的情况下把一种新形式的峰会作为一次“社交媒体”活动。至于国际规则和规范的当代结构,如果要证明它有重要作用,就不能仅仅通过联合声明加以肯定;必须把它作为一个共同信念问题加以促进。

在整个过程中,美国的领导作用不可或缺,甚至在它模棱两可地发挥这种作用的时候都是如此。它曾既寻求稳定,又倡导通用原则,而这些原则与不干涉主权原则或别国历史经验总是不可调和。在美国经验的独特性和对其普遍性的理想主义自信之间需要保持平衡,在过度自信或反省之间也需要保持平衡。从本质上说,对这种平衡追求没有止境。我们没有退路。

我们从这里走向何处?

国际体系的重建是对我们时代的政治家才能的最终挑战。对失败的惩罚与其说是国家之间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尽管在某些地区这种情况没有被排除),不如说是向认同特定国内结构或治理形式的势力范围的演变—例如,威斯特伐利亚模式,而不是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模式。在其边缘,每个势力范围都想用其实力考验其他被视为非法的秩序实体。它们将为实现即时通讯联网,不断地相互侵犯。这一进程的紧张局势迟早会沦为在大陆范围,甚至全球范围争夺地位或优势的活动。区域之间斗争的破坏作用可能比国家之间的斗争更大。

当代对世界秩序的追求将需要一项连贯的战略,在不同的区域内确立秩序概念,并使这些区域秩序彼此相关。这些目标不一定相同或自我调节:一个激进运动的胜利可能会给一个区域带来秩序,同时可能会给所有其他区域带来混乱或与这些区域发生混乱。一个国家对一个区域的军事统治即使表面上带来秩序,也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造成危机。

对力量平衡概念的重新评估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在理论上,力量平衡应该完全可以计算;在实践中,把一个国家的计算与其他国家的计算协调一致并实现对限度的共同认识极其困难。外交政策的推测元素——需要使行动与无法验证的评估吻合——在动荡时期是最真实不过的。那么,旧秩序在不断变化,而新秩序的状态又极其捉摸不定。因此,一切都取决于未来的某种构想。但不同的结构可产生对现有趋势的重要意义的不同评估,更重要的是产生消除这些差异的对立标准。这是我们时代的困境。

一种确认个人尊严和参与性治理,并根据商定的规则在国际上合作的国家世界秩序,可成为我们的希望,也应该使我们感到鼓舞。但是,超着这种秩序的进展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中间阶段予以维持。埃德蒙·伯克曾经写道,“如果默许某种不能使抽象概念尽善尽美的有限计划,而不是争取更加完善”,并坚持立即达到极限,从而冒引发危机或幻想破灭的风险,这通常会更符合我们的利益。美国需要的战略和外交是要考虑到旅途的复杂性——既考虑目标的崇高,又考虑实现目标的人类努力的固有不完整性。

要在 21 世纪世界秩序的演变中扮演负责任的角色,美国必须准备为自己回答若干问题:

我们寻求防止什么情况发生? 不管如何发生,如果需要,是否需要单独行动? 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社会生存的最低条件。

即使得不到任何多边努力的支持,我们寻求达到什么目标? 这些目标决定国家战略的最低目标。

在得到一个联盟支持的情况下,我们达到什么目标或防止发生什么情况任这个答案决定我国作为一个全球体系一部分的战略愿望的外部界限。

即使在一个多边组织或联盟的敦促下,我们不应参与什么活动? 这个答案决定美国参与世界秩序的限制条件。

最重要的是,我们寻求推动的价值观的本质是什么? 什么用途部分取决于具体情况?

这些同样的问题原则上适用于其他社会。

对美国来说,追求世界秩序取决于两个层面:对通用原则的颂扬需要同时承认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现实。在研究充满挑战的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时,我们必须肯定美国的特殊性质。对于把自己的承诺或认同感放在一边,转而采取看似不太艰辛的历程的国家,历史不给喘息的机会。作为现代世界阐明人类的自由追求的决定性国家和证明仁爱价值观的不可或缺的地缘政治力量,美国必须保留它的方向感。

要应对我们时代的挑战,美国扮演有目的的角色在哲学上和地缘政治上必不可少。然而,世界秩序不能由任何一个国家单枪匹马地建立。要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秩序,其组成部分在保持自己价值观的同时需要获得全球性的、结构性的和法律上的第二文化——也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视角和理想的秩序概念。在这个历史时刻,这将是反应当代现实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化。

我们有可能把不同的文化转化为一个共同的体系吗?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由大约 200 名代表起草的,其中没有一个人作为一个主要人物载入史册。当时,他们分成两组,在两个相距 40 英里的城市举行会议,在 17 世纪这是相当远的距离。他

们克服了他们的障碍,因为他们都有在 30 年的战争中惨遭蹂躏的经历,他们决心防止战争的重演。我们的时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前景,需要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免被战火吞没。

远古时期的神秘片段表明,人类状况的无可救药的标志是变化和冲突。“世界秩序”像火一般,“按规律点燃,按规律燃烧”。作为“万物之父亲和万物之王国”,战争给世界带来变化。但是,“事物的统一性在于表面之下;它取决于对立面之间的平衡反应。”我们时代的目标必须是实现这种平衡,同时抑制战争造成的破坏。我们不得不在历史的激流中这么做。这种情况的已知比喻在这个片段中表达的意思是,“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历史可被认为一条河,但是河水会不断变化。

很久以前,我年轻气盛,认为自己能够宣布“历史的含义”。现在我知道,历史的含义是一个有待发现,而不是有待宣布的问题。它是我们尽可能妥当地回答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它是仍然可以辩论的问题。判断每一代人的标准是他们是否面对过最大、最重要的问题,迎接这些挑战的决定必须由政治家作出,然后才有可能知道结果。(曹佳兴译)

【书籍摘录】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29日刊登该书摘要《亨利·基辛格谈建立世界新秩序》如下:

利比亚陷于内战,原教旨主义军队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一个自封的“伊斯兰国”,而阿富汗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处在瘫痪的边缘。雪上加霜的是,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旧态复萌,与中国的关系是承诺合作与公开对骂并存。曾经是现代基石的秩序观如今岌岌可危。

对世界秩序的追寻长期以来几乎完全是由西方社会的概念加以解释的。二战以来的几十年中,美国——由于经济和民族自信增强一开始接过国际领导这把火

炬,而且增加了新的内容。作为一个明确基于自由和代议治理思想而建立的国家,美国认为自己的崛起与自由和民主的传播息息相关,而且认为这些力量能够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欧洲传统的秩序观则认为民族与国家天生是争强好胜的;它依赖于均势和政治家开明来限制其相互冲突的野心之效应。美国人普遍的观点认为人天生是理智的,倾向于和平妥协和讲究实际;因此传播民主是国际秩序的首要目标。自由市场将使个人得到提升,使社会繁荣富足,使经济相互依存取代传统的国际对抗。

建立世界秩序的这一努力在很多方面结出了硕果。世界大部分地区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所统治。民主和参与式治理的传播即使没有成为普遍现实,也已成为一个共同的愿望;全球通信和金融网络在实时运行。

从1948年到本世纪初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瞬间,在这个瞬间,全球世界秩序刚刚起步,兼顾美国理想主义和欧洲传统的国家和均势思想。但是世界大部分地区从来没有与西方相同的秩序观,只是默认西方的秩序观。这种保留现在正变得直言不讳,比如在乌克兰危机和南海问题上。西方建立和宣传的秩序现处在转折点上。

首先,国家——国际生活正式的基本单位——的性质承受了多重压力。欧洲开始超越国家,主要基于软实力原则来制定外交政策。但是,脱离战略概念的合法性主张能否维持世界秩序令人怀疑。而且欧洲尚没有赋予自己国家属性,在冒内部出现权力真空和周边出现非均势的风险。与此同时,中东部分地区因教派和民族不同而四分五裂,相互之间发生冲突;宗教民兵组织以及支持它们的大国随心所欲侵犯边界和主权,造成了失败国家控制不了本国领土的现象。

亚洲的问题与欧洲正相反:均势原则盛行与公认的合法性概念没有关系,致使某些分歧走到对抗的边缘。

国际经济与表面上支配它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冲突也削弱了建立世界秩序所需要的共同目的感。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而世界的政治结构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无视国家边界;而外交政策则是坚决维护国家边界,即使在谋求调和相互冲突的国家目标或世界秩序理想时也是如此。

这种动态造成了几十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不时被似乎不断加剧的周期性金融危机打断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1年以及2007年又卷土重来的美国金融危机;2010年的欧洲金融危机。赢家对这种制度几乎没有什么保留意见,但是输家——比如陷入错误的结构设计的国家,欧盟的南方成员国就是这样——谋求通过否定或至少阻碍全球经济体系运行的办法来加以补救。

因此,国际秩序面临一种自相矛盾的窘境:其兴盛依赖于全球化的成功,但是这个过程产生了往往与其志向背道而驰的政治反应。

当前世界秩序的第三个缺陷,尽管不大,就是缺乏一种大国在重大问题上进行磋商和可能进行合作的有效机制。这可能听上去像一种离奇的批评,因为现在有很多多边论坛——比历史上其他任何时候都多。然而那些会议的本质和召开的频率与制定长远的战略背道而驰。这种过程充其量不过是讨论一下紧急的战术问题,最坏的情况是,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最高级会议,是“社交媒体”事件。当前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架构,如果要做到切实可行,就不能只是通过发表联合宣言来确立;必须作为一个共同的信仰来培养。

国际秩序失灵的后果,与其说国家之间将爆发大的战争(虽然有些地区这种情况仍可能发生),不如说将演变成与特定国内结构和治理形式一致的势力范围。在其边缘,每个势力范围都忍不住要对被认为非法的其他实体试试自己的实力。地区间斗争可能比国家间斗争破坏力更强。

当前谋求建立世界秩序的努力需要一以贯之的战略在不同的地区内部树立秩序概念,使地区秩序相互关联。这些目标不一定是自我调和的:一个激进运动组织的胜利可能给一个地区带来秩序,同时可能为其他地区内部发生动乱和与之发生混战等埋下祸根。一个国家通过军事手段主宰一个地区,即使能够带来表面上的秩序,但是可能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危机。

建立各国矢志维护个人尊严和参与性治理并按照公认的规则进行国际合作的世界秩序可能是我们的希望,应该成为我们的志向。但是其进程需要经过一系列的中间阶段。

要在 21 世纪世界秩序的演变中发挥负责任的作用,美国必须准备好回答它将面对的很多问题:不管世界秩序如何演变,而且如有必要独自行动,我们要防止什么情况发生? 我们想要实现什么目标,即使没有多边的支持? 如果只得到一个联盟的支持,我们要实现什么目标或防止什么情况发生? 我们不应该干什么,即使受到多边组织或联盟的鼓动? 我们谋求推广的价值观的本质是什么? 这些价值观的推行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形势?

对美国来说,这将需要在两个看似矛盾的层面上进行思考。推广普世原则需要同时承认其他地区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安全观这一现实。即使研究了具有挑战性的几十年的教训,也必须肯定美国是个例外这一特征。历史不会给放弃自己的身份认同而走上一条看似不那么艰苦的道路的国家以喘息的机会,但是也不保证这个最为崇高的信念在缺乏一个全面的地缘政治战略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成功。

(刘宗亚译)

专家及媒体对基辛格新著《世界秩序》的相关评论

专家评介:美国《华盛顿邮报》9月4日发表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书评文章《希拉里·克林顿评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一书》如下:

美国人今天环顾世界时,我们看到了一场又一场危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主义和混乱、西非的一场致命的流行病、中国东海和南海由于领土纠纷而引发的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仍未产生足够的增长或共同繁荣的全球经济——美国几代人致力于创建和捍卫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看来正承受着来自每个角落的压力。难怪那么多的美国人对我们在世界上的作用和我们的未来表示怀疑甚至担忧。

亨利·基辛格在他的新书《世界秩序》中解释了这一挑战的历史范围。他的分析尽管在具体政策问题上有一些分歧,但基本上符合奥巴马政府六年来旨在建立21世纪安全与合作的全球架构的努力背后的大战略。

冷战期间,对我们和世界来说,美国两党一致的承诺,即保护和扩大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与合作的国际社会,最终被证明是成功的。基辛格对这一愿景的概述今天听起来也很相干:“各国遵守共同的规则和规范,拥抱自由的经济体系,明确放弃征服领土,尊重国家主权,并采取参与性和民主的治理体系,从而建立不可阻挡地扩大的合作秩序。”

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力量和我们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联盟所推进的这一体制,曾帮助我们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给美国人和亿万别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好处。尽管如此,今天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尤其是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并不知

道这些成功的案例,因此,向人们说明并告诉他们美国的领导能力是什么样子,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即正如基辛格所说,很多人都想知道,“我们是否面临着这样一个时期,即超越任何秩序约束的力量决定着未来?”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熟悉的问题。当我 2009 年 1 月走进国务院时,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发生令人目眩的变化的时候,但在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上,却没有人能达成共识。这场经济危机会带来新形式的合作呢,还是回归保护主义与不和谐?新技术会进一步帮助公民们为领导人建立问责机制,还是帮助独裁者对持不同政见者保持控制?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崛起中的大国会成为全球问题的解决者,还是全球搅局者?界定非国家行为者新的影响的会更多的是恐怖主义网络和犯罪集团所构成的威胁,还是勇敢的非政府组织的贡献?日益增长的全球相互依存关系会带来团结的新感觉,还是冲突的新来源?

在其 2009 年 12 月的获得诺贝尔奖演讲中,奥巴马总统解释了我们所面临的首要挑战。他说:“美国主导了构建维护和平的架构。……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 10 年,这个旧的架构在威胁的压力下不堪重负。”

我很高兴能够帮助总统开始重新设想和加强全球秩序,以满足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的要求。在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我们奠定了基础,从修复联盟到更新国际体系,以及在伊朗的核计划和本·拉登的威胁等挑战问题上采取果断行动。

第二任期的危机凸显了,这是一个需要一代人时间才能完成的项目,要求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做出多年的承诺。基辛格写道,外交政策并不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而是“管理和应对反复出现的挑战的过程”。这让我想起约翰·肯尼迪的意见,即和平与进步“不是基于人类本性的突发革命,而是基于人类制度的逐渐演

变……一个过程——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美国在最好情况下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国家。如果我们继续致力于更新和维护全球秩序,就会决定我们实现和平、进步和繁荣的未来,让世界各国人民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天赋的潜能。

《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专门探讨这一挑战。这就是基辛格,如老酒醇香,以其独有的广度和敏锐相结合,外加其将头条新闻连接到历史趋势线的巧妙本领——在这一情况下,是很长的趋势线。他高谈阔论,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微处理技术,从孙子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人物塔列朗再到推特网。他把印度的秩序观追溯到印度教的史诗,将穆斯林的观点追溯到穆罕默德的战役,将欧洲观点追溯到 30 年战争(这引发了与今日中东的一番比较),把俄罗斯的看法追溯到“草原上的强硬学派,那里有一系列游牧民族,在一个没有固定边界的开阔地带争夺资源。”这一长远的视野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从普京的侵略到伊朗的谈判策略的种种问题,但这番论述也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可以如何被塑造成共同的秩序。”

鉴于今天的挑战,所以基辛格对亚太和中东地区的分析特别有价值。

在亚洲问题上,他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该地区新兴大国都有自己对区域和全球秩序的愿景。这些愿景受到其自身历史和现状的影响。我们如何与这些不同的愿景较量——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同时在一个稳定和繁荣的地区维护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将大大有助于确定我们能否应对范围更为广泛的全球挑战。

这种有条不紊的多边外交往往是缓慢和令人失望的,因为这在国内很少成为头条新闻,但却会带来影响千百万人生活的真正好处。而如果没有有效的地区秩

序,挑战就会倍增。试想一下,在中东地区,基辛格指出“若论维护国际秩序的挑战之复杂——不仅在维护地区秩序,而且在确保世界其他地方的和平与稳定方面——都非该地区莫属。”

基辛格是朋友,我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也依靠他出谋划策。他定期来访,分享对外国领导人的敏锐观察,并把有关他的旅行的书面报告发给我。虽然我们对世界和我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的看法常常截然不同,现在和过去也都主张采取不同的对策,但这本新书所清楚阐明的,则是我们和奥巴马总统的一种共识,这就是对美国继续担任领袖,服务于维护公正和自由的秩序的不可或缺性的信念。

专家评介: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9月5日发表南加州大学昂鲁政治研究所主任丹·施努尔的书评文章《亨利·基辛格的〈世界秩序〉是及时的警告》如下:

在这个时代,科技、通讯和交通方面的进步已大幅缩短各个文化和国家之间的距离;这个国家在一个世纪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承担起经济、外交和军事上的领导角色,从而成为全球性超级大国。但是,我们的主要政党的极端派孤立主义却正在迫使美国放弃其世界舞台上的传统角色。

对这场撤退,保守派共和党人和自由派民主党人都同样参与其中。一个党修筑围墙,以通过阻碍移民改革来阻止人员流动。另一个党则构建壁垒,以通过阻塞自由贸易来阻止货物和资本的流动。这种十分严重的极端化从美国国内政策角度得到了全面的记录。双方的强硬派党徒们相互侮辱和辱骂,而国家的经济、教育和能源需求则仍然陷入僵局与泥潭。

但是,同样举足轻重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所受到的头脑僵化的影响。因此,现在成了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国际主

义最明显和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之一——重新大显身手的一个关键时刻。

基辛格利用他的第 21 本书——《世界秩序》——警告人们提防孤立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危险,将其视为具有不同重点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障碍,并主张,在日益互联的世界上,美国更加需要承担领导作用。

他写道:“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这样,在塑造当今的世界秩序方面发挥了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也对参与其中表现出如此的矛盾心理。”

基辛格引领读者游历了几个世纪的欧洲、俄罗斯、亚洲和中东的文化、社会和心理发展,介绍了这些经历是如何影响当代世界舞台上的领导人行为的。他指出,我们的国家不愿意承认这些差异,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军事和外交上的大灾难,并警告说,如果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不做出更大努力,承认西方的做法并不具有普遍性,就很可能造成类似的后果。

他介绍了欧洲解决冲突的理念。这一理念可追溯至十七世纪中叶,旨在鼓励交战国家之间建立平衡和达成妥协,以便于彼此敌对的国家根据国际准则和集体监督制度共存。但是,《世界秩序》一书进一步探讨历史,以说明在伊斯兰教、俄罗斯和中国的传统中,其他国家的地域、宗教和文化影响如何使实现冲突后的平衡变成如此次要的事情。

他说,由于我们的竞争对手和敌人具有与我们通过西方和欧洲的惯例所继承的根本不同的目标,所以如果希望他们遵守我们有关实现和解的规定方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尽管基辛格有关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的地缘政治分析是令人信服的,但贯穿全书的越来越明显的一点是,他的建议很难令主导着我们当前的政治格局的茶党和“占领派”接受。(当然,基辛格的专业是国际关系,而不是国内政治。也

许,戴维阿克塞尔罗德和卡尔罗夫可以在其新书中迎接这一挑战。)

美国目前的孤立主义倾向不是什么新鲜事:基辛格讨论了两次世界大战、朝鲜和越南战争之后国家向内看的关注倾向,解释了美国不时地放弃国际参与如何造成真空,让机会主义侵略者有机可乘。我们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被拖入我们的缺席所造成的地缘政治力量失衡酿成的更多军事冲突。他的观点产生了共鸣,在这样一个时刻尤其强烈,就是当美国陷入困境,难以决定是否可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军事卷入,就在我们的部队刚刚离开的那块中东土地上。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感到战争疲劳的一国民众——在任何时代——都热切希望在长期的冲突结束时获得当之无愧的休息。但是,即使基辛格承认这种诱惑,他也一再强调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发生在没有美国的抗衡力量抵御来自地球其他角落的侵略情况下。

基辛格写道:“……对自信和自省的两极之间的这种平衡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它所不允许的是撤退。”

马克·吐温更多地以其幽默感,而不是其外交手腕著称,他曾经说过:“历史不会重演,但却总会像押韵一样惊人地相似。”基辛格的建议远非如此巧舌如簧,但对现在似乎想把世界其他国家打发掉了事的这个国家来说,却要宝贵得多。

专家评介:美国《华尔街白报》9月6日刊登美国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詹姆斯·特劳布的书评文章《认为历史是悲剧性的并非美国人与生俱来的观点》如下:

自从2001年的恐怖主义袭击颠覆了我们的世界意识以来,美国一直由一位试图把美的价值观强加给中东、却遭到灾难性失败的保守派理想主义者,然后由一位邀请美国的敌手在一种新的谦卑和相互尊重基础上与我们恢复接触、但却发现自

己的希望破灭的自由派理想主义者所统治。

简言之,现在是亨利·基辛格这位不抱幻想的分析家的时刻。他用了60多年时间让美国的外交政策接受心理治疗,又花了8年影响巨大的和有争议的功夫加以实施。基辛格先生现在91岁。他撰写了一本新书,其简明的标题是《世界秩序》。这一事实本身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实际上继承了他的一项努力,就是削弱一个世纪以来深刻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左右两派的浪漫虔诚。基辛格先生福大命大,很可能要比许多仇恨他的人活得更长,也会让另外一些人忘记,他们首先是为什么仇恨他的。

《世界秩序》一书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这一论点本身,因为对任何对基辛格先生的工作略知一二的人来说,这都会是很熟悉的,而是在于提供有关这一概念的一部自然历史的想法。他认为,按照我们的理解,世界秩序既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实体,也不是治国之道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而是受到具体人物的性格和经验影响的一种文化和历史产物。它是作为对30年战争(1618年至1648年)的残酷的宗教暴力反应而在17世纪欧洲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的后裔。

对基辛格先生来说,威斯特伐利亚并不简单地是许多体系当中的一个,而是所有这种体系当中最讲道德的、在知识甚至美学上最为赏心悦目的一个。这个故事开始于法国的红衣主教黎塞留(1585年至1642年)。他阐明了一种学说,即“国家是依靠其本身素质而存在的一个抽象的和永久的实体”,掌握着自己特殊的利益——存在的理由。当17世纪中叶的宗教战争耗尽了所有各方的精力时,17世纪40年代中期在德国西北部的威斯特伐利亚省聚会的外交官们商定,他们不会寻求把自己的宗教原则彼此强加。各国不再会干涉别国的国内秩序。基辛格先生写道,“威斯特伐利亚概念把多样性当作起点”,因而吸收“多个社会”参与“对秩序共

同的寻求”。

基辛格先生讲述了对这种世俗的或不可知的秩序所构成的挑战的历史。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兰西帝国)寻求在全欧洲宣传共和主义,就像德国的王子们曾经在30年战争期间寻求把新教强加给信奉天主教的邻国一样。俄罗斯用自己的有关基督教正统学说和专制主义控制的敌对的愿景威胁这一体系。此后,统一的德国的扩张主义则进一步扰乱了欧洲腹地力量的微妙平衡。

基辛格先生所描述的恶棍则是拿破仑和俾斯麦等加法器式的人物。英雄则是各国之间的一种不断变化的平衡的巧妙的操纵者——塔列朗与梅特涅。基辛格先生的欧洲中部的灵魂中的某种东西对威斯特伐利亚的治国之道感到欣喜若狂。这种东西在他手中听起来很像流体动力学和爵士乐的结合。他写道,力量平衡的国务活动家“必须在可能的事情的外部边缘上采取行动,弥补本国社会的经验及其野心之间的空白外缘。由于人们所熟悉的事情的重复导致停滞不前,所以并不需要什么大胆行为”。基辛格先生煞费苦心断言,力量平衡的外交并产生于对道德原则的愤世嫉俗的冷漠,而是产生于使国家免于在不可调和的国家利益概念或者至善问题上彼此毁灭的具有深刻道德意义的必要性。

威斯特伐利亚体制仅仅是欧洲的秩序原则。截然不同的和远非那样丰富的秩序构想出现在中国、波斯、俄罗斯、奥斯曼帝国,当然还有美国。对这些国家当中的每一个,基辛格先生都从历史角度加以描述,然后才转向其当代的化身。基辛格先生认为,在伊朗,霍梅尼在其所继承的波斯伟大文化的意识上嫁接了一种伊斯兰教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国家看作对使异教徒皈依的超然的义务所构成的障碍。今天的伊朗不仅作为一个帝国的继承者,而且作为一项革命事业,都危及到世界秩

序。从威斯特伐利亚的角度看,伊斯兰世界看来仅仅达到了 30 年战争的早期阶段。这种局面会使参战者精疲力竭,因而建议采纳互不干涉的美德。

在所有威胁到黎塞留所修筑的大厦的普遍化教条当中,基辛格认为最吸引人的是美国的教条。新大陆向信徒招手:基辛格先生清楚地阐明,就在欧洲人认识到,其“一种单一的神圣治理统一一下的大陆的理想永远不会实现的时刻,美国提供了一个地方,可以在遥远的海岸上做成这件事”。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时,其明确的目标就是用自己的全球民主的解放愿景取代力量平衡的政治。伍德罗·威尔逊以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政治导致欧洲走上了战争的恶性循环之路。

在《外交》(1994 年)一书中,基辛格承认,自从那时以来的所有美国总统都是威尔逊主义者。不能与此产生共鸣的领导人就不会启发美国人民,使之愿意离开自己的大陆堡垒,到国外去冒险。尽管如此,基辛格先生在这里说,就像他经常说的一样,威尔逊是一个迷惑的灵魂,天真的想象,世界可以通过集体行动改恶从善。他的继承人则传播了这种错觉。

基辛格先生写道:“威尔逊的悲剧在于,他给 20 世纪的决策权所留下的是一种背离了一种历史或者地缘政治感觉的崇高的外交政策学说。”很难与他在这里所得出的论断争论,即美国人发现,把外交政策看作一种伸张正义的目的论斗争,要比将其视为一种“实现应急目标的长期努力”容易一些。认为历史是悲剧性的,这一观点并非美国人与生俱来。

尽管如此,基辛格先生还是盛赞了他们当中最为不顾一切的威尔逊主义者乔治·W·布什。他断言:“小布什在伊拉克的目标和献身精神给国家带来荣誉,即使在这种目标被证明在美国的政治周期范围内无法实现的一些情况下也是如此。”

不是总统及其主要顾问在“9·11”事件以前一直是基辛格主义的现实主义者。恐怖主义使他们相信,威斯特伐利亚的不可知论是一纸空文。由于局势证明了美国十分容易受到在失败的和压迫人民的国家孵化的意识形态的侵害,所以正如总统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所说,很显然,“我们国家中的自由的生存日益取决于其他国度的自由的成功。”就是说,互不干涉内政不仅在道义上是可疑的——就像始终的情况一样——而且在战略上是负担不起的。

布什先生是正确的吗?抑或,在国外提倡民主是否是一种威尔逊主义的妄想,无论这样做可能多么符合美国的利益?基辛格先生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并没有这样说,但在别处例如,在他2001年出版的《美国需要一项外交政策吗?》一书中——他迅速解决了提倡民主和人道主义干预的这两个问题。2011年阿拉伯起义可怕的发展轨迹,尤其是ISIS的世界末日军队令人恐怖的崛起,对想要把玩中东国家内部事务的人们并没有提供很大的鼓励。

在美国不仅受到俄罗斯等典型的扩张主义国家,而且受到“基地”组织和ISIS等非国家行为体威胁的时候,威斯特伐利亚很可能是有关世界秩序的一种过时的隐喻。然而,由于世界事务十分棘手,所以把外交活动当作实现应急目标的一种长期努力的戒律使人感到几乎是很受启发的。国务卿约翰·克里在处理一场危机之后接着迅速处理另一场危机,以谋求实现看来无法实现的目标,因而难免精疲力竭,所以他可能找不到比这更为当之无愧的座右铭。(尹宏毅译)

专家评介:日本外交学者网站9月21日发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教授詹姆斯·R·霍姆斯的书评文章《美国能挽救世界秩序吗?》如下:

在教授们中间流传着一个很老的笑话。当问他是否读过某本书时,老前辈回

答说：“读它？我还没写书评呢！”

“海军外交”博主尚未读过亨利·基辛格的新书《世界秩序》。我也不打算写书评。我打算做的是提供一些个人看法。在这本新书首发前不久，《华尔街日报》刊登了该书摘要，引发了我的一些想法。

对于基辛格，底线似乎是，美国应该接受以下事实，即其对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愿景最多在世界部分地区获得了勉强的支持。这与传统的思维方式相反。比如说，在一个多世纪前，西奥多·罗斯福恳求先进国家行使“国际警察权”。它们应该维持其身边秩序，同时带领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世界。在二战即将结束阶段，富兰克林·罗斯福设想了“四位警察”，即他希望战争胜利国充当国际警察的角色。的确，“四个大国”——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被解放的法国也加入了——成为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永久性成员国。

安理会成员国本应将启蒙与物质力量结合起来，进一步推动实现编入了《联合国宪章》的共同目标。言之有理，对吗？但两位罗斯福及对世界秩序充满热情的人士们假定，国际警察将执行共同的法律主体。自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以来，安理会常常陷入僵局。假如建立世界秩序的前辈们错了，将会怎样呢？如果每个大国的世界观都不相同，会怎样呢？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在管辖权裂缝处会发生什么呢，当警察就管辖权边界发生争执时会发生什么呢，当一位警察干涉另一位警察的辖区时，又会发生什么呢？

麻烦。这似乎是基辛格努力克服的麻烦。他提醒我们，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有其自己的传统和历史。不同的起源产生不同的观点，因此对于什么规定和规则应该约束国际体系，各国观点不尽相同。在二战后，当美国制定了目前的国际法律和机构体系时，它们为了和睦相处而合作。尽管如此，在它们中间，有些国家从未欣

赏过源自西方的规则。这套规则是舶来品,最多不过要求中等忠诚。基辛格指出,“世界广大地区从未赞同过西方的秩序概念,仅仅只是默默顺从”。

它们不再需要默默顺从了。在这些国家积累巨大权力之际,新的战略前景在其眼前展开。经济增长带动了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增强。雄心常常伴随着权力一起膨胀。于是,新的处于上升阶段的、自信的大国完全有理由试图让自己的规则在邻近地区实行——即使不在远处实行的话。

防御性和进攻性的本能交织在一起,助长了这类政策。伍德罗·威尔逊希望让世界成为对民主国家而言安全的地方,既为了保护美国,也因为他认为,民主国家对于每个人都是如此的好。防御,进攻。俄罗斯也许希望世界成为对寡头统治的国家而言安全的地方,而中国或巴西也都有各自的希望。诸如此类。简言之,这些大国将不会仅仅因为美国认为它们应该这样做,它们就欣然接受美国的方式。

关于问题讲了这么多;解决办法是什么呢?让我们将基辛格的愿景评定为一次战役。卡尔·冯克劳斯威茨告诉我们,抓住事业的本质是治国之道中首要的、最基础、最具决定性的行动。如果你不在地图上标注周围环境,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知道选择哪条路,什么危险也许会阻碍你的道路,或者甚至是何时你会抵达目的地。

首先,这将是长期战役。重新恢复人们对真理、公正和美国方式的真诚支持相当于一项无限期的项目。基辛格促使美国普通民众及其领导人承认这一事实。重塑世界意味着改变人们的想法和态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也许意味着使世界秩序去美国化概念。轻视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外人的观点和习俗是人类的本性。

说服其他人相信,美国提出的世界秩序愿景并非利己性的,也不带有模糊的威胁性,这将让不同的社会宣称拥有这种愿景。这将需要花费时间,这就是为何西奥多·罗斯福感到失望的原因,他认为自己设想的黄金年代仍“遥遥无期”。

其次,基辛格的追求并非静态的。动态将是其口号。另外,与任何追求一样,它常常会遭到抵制。强大的对手也许会得出结论说,美国式的世界秩序与其利益和理想相悖。他们也许会试图阻碍、收买或腐化这一追求。假设这一追求保持坚定不动摇,美国将重新评估和适应——促使对手采取自己的对抗手段。然后反反复复,这一追求将前行。在这一相互作用的、开放式的黎明之争中,逆转命运、再次逆转、再再逆转将成为司空见惯的常态。

现在我们身处何处?基辛格似乎认为,二战后的世界秩序之役在世纪之交达到顶点。如果是这样的,那么美国、美国盟友及其朋友如今会发现自己处于守势,而非撤退。但同时,基辛格似乎认为,美国如今可以开始进行对世界秩序的追求,就像它是全新的冒险那样。

其同胞克劳斯威茨将会不同意他的观点。以下是原因。想想克劳斯威茨关于胜利和进攻的顶点概念。当某个好斗之人煽动进攻行为,——比如说,通过入侵邻居——这将增强其军事优势,达到最大化。这也将是其最大化的外交优势,即间歇时可以在谈判桌上从对手那里榨取最多利益。尽管如此,过了顶点后,防御方会缩小优势差距。它会反抗和革新,耗费进攻方的动量和资源。最终,优势差距也许会逐渐缩小到零。更糟的是,开战一方的战士也许会现自己是更弱的竞争者。这会招致灾难。在进攻顶点过后,物质和政治失利将就在眼前。找到解决如何重获动量的办法,势在必行。

如果从某种隐喻意义来看,这一战场节奏也适用于基辛格的政治互动领域。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发动了其世界秩序进攻战役,基辛格似乎认为,这一战役在 2000 年左右达到顶点。这一历史仍在起作用。攻势趋势线也是如此。如果你沿着曲线标出世界秩序项目的成功,那么按照基辛格的估计,它会在约 2000 点达到顶峰,之后会扭头进入下降趋势。这条曲线的负斜率将直观地揭示,美国外交否决权自此之后是如何变弱的。

因此,华盛顿可以完全地重新开始,这让人非常怀疑。重获失去的动量——让那条曲线弯曲,向着胜利再次上行——比重新开始更加困难。美国领导人能如何重新采取攻势?劝说——持续的外交演说——必定是其战略的一部分。但要重获美国魔力,就要重建国家,再度实现繁荣,并更新其军事实力,这些至关重要。这也是永无止境的努力。

正如一位伟人曾说过的,人们喜欢胜者,鄙视失败者。以和平和富足来衡量,如果美国关于世界秩序的计划不负众望,那么它将赢得外国听众的青睐。如果不能做到,那么人们将会对美国的恳求充耳不闻。如果一项事业涉及相冲突的人类意愿,那么在这项事业中,不存在确定的事情。基辛格项目的结果绝非注定的。它将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付出持续的、艰苦的努力。

让它实现吧。(胡晴译)

媒体评介: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网站 9 月 6 日发表书评文章《有点儿混乱》
如下:

虽然从 1977 年离开美国国务院算起,亨利·基辛格已经离开官场近 40 年了,但他仍具有非凡的影响力。看他的书时,你能感受到原因在哪里。虽然俄罗斯把黑手伸向了乌克兰,中东一团混乱,而中国正在检验自己日益增长的实力,但基辛

格分析,当今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建立新世界秩序的必要性。他从不掩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十分悲观。

在17世纪初的欧洲,“世界秩序”使现代国家从无休止的战争中产生,这个过程几乎是偶然的。疲惫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者们,决定求同存异。每个国家都承诺,接受邻国价值观的存在。不存在某种必胜的真理。权力的平衡,遏制了野心。随着帝国主义的衰落,殖民地开始用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民族自决,来对抗遥远的统治者,在美国的支持下,欧洲对于国际秩序的定义,一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成立后,才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该秩序受到方方面面的攻击。欧洲和美国要求所有国家都遵守西方的自由价值观。在两场世界大战中被削弱的欧洲实力,已经随着欧盟一体化的深渊消失。作为目前最强大的超级大国,美国或许有能力防止地缘政治失控,但该国已经不愿意担任执行者或平衡者的角色了。印度和中国等亚洲国家正在崛起,这些国家没有用威斯特伐利亚思维去思考权力的传统,并且可能想要修改世界体系。而在中东,疯狂的伊斯兰主义者,正在制造大屠杀,希望实现《古兰经》里哈里发的统治。

基辛格经常被介绍为一位重要的现实主义者:他支持一个所谓十分深奥的道理,即外交政策只关系到实力和利益,而价值和道德,只是为那些愚钝无能的人准备的。但他的世界观却更微妙。如果一种体系是基于实力建立的,而缺少合法性,那么,它终将自我毁灭;如果它主张道德,但缺少执行的能力,那么,它终将解散。当今的问题是,在几乎所有人看来,当前的体系,既不具备实力,也不具备合法性。西方无法实施有争议的自由秩序。中国得不到它认为财富和实力日益增长的大国应当得到的权力。

俄罗斯认为,西方的规范是西方权力扩张的特洛伊木马,终将自食其果。伊斯兰主义者反对所有世俗秩序。

解决办法是什么?基辛格仅仅用了4页,就大概给出了他的答案,包括不明确地呼吁,在实力和合法性之间,谋求一种新的平衡——但他在《世界秩序》一书一开始就承认,这一点很难实现,尤其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各国都受到新媒体带来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基辛格如今是一位富有的顾问。他没有把坏处分析得十分透彻,这就像他总是习惯于用恭维之辞去粉饰对在世的政治家的批评,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不让他们和客户难堪。例如,他写道:“在此,我想表达我对乔治·W·布什总统一贯的尊重和敬爱,在动荡时期,他用勇气、尊严和信仰,领导了美国。”这让人感到遗憾,因为他之前几章对欧洲、美国和圣战主义的分析,既充满了智慧,又条理清晰、简明扼要。当然,或许基辛格认为,读者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到他的意思:你不必是梅特涅,也能明白,这位年事已高的政治家,对未来十分悲观。(王栋栋译)

媒体评介: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8月26日发表高级编辑雅各布·海尔布伦的书评文章《基辛格的建议》如下:

在其新书《世界秩序》中,基辛格阐述了他为什么仍然如此殷勤地为美国总统以及其它外国领导人担任顾问。基辛格以他特有的简明深刻的笔触,带读者重温了一次西方崛起的历程。基辛格并非为读者列举了一长串的政策。相反的,他让读者对一些事件进行沉思,并带来了另一种思考方式,这些事件与当代外交政策论述极为不同。外交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美国的学院废弃不用,但基辛格却能熟练地挖掘过去,并找到过去与现在的相似之处。基辛格反过来谈其关注的中心,即

在大国之间建立均势的困难。基辛格认为,21 世纪的主要挑

战就是,在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主义越来越多、技术不断进步以及武装冲突增加的时代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基辛格从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至法国大革命期间欧洲的紧张局势说起。然后,他谈及伊斯兰教国家和中东。对奥斯曼帝国以及伊斯兰教国家进行仔细的研究之后,他研究了中国的崛起及其对邻国的影响。但最长的篇幅却留给了他所认为的美国对其超级大国地位犹疑不决的态度。他追溯了从西奥多·罗斯福至今美国崛起的过程,并探讨了自己在尼克松政府任职期间的经历。自始至终,他致力于在美国的普遍主义愿望与残酷的现实之间调和残酷的现实就是,相互竞争的大国都决心要保护并实现各自对秩序的构想和理念。

没有哪个地方对秩序的理念比欧洲在其大部分历史上对秩序的理念还要脆弱了。正如基辛格所描述的,与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相比——在这些地方,政治斗争是为了控制业已建立起来的秩序,欧洲从未有过一个单一的、固定的身份认同。这总是一个地理名词。

尽管他强调结构性因素,基辛格也并未忽视个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举例而言,他指出,作为一名政治家,红衣主教黎塞留的观点就是国家应当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单位。

黎塞留坚持对国家的重视,这被编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终结了 30 年战争,并在基辛格的国际关系思想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基辛格列举了很多有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并强调该合约建立起来的和平仍然对现在具有深远的影响。在 17 世纪,交战中的欧洲各国的代表旨在通过相互平衡建立稳定。30 年战争可能以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斗争为开端,但基辛格恰如其分地

评论道,这场战争很快就演变为联盟关系不断发生改变的“一场混战”。合约最具创新意义的就是确定国家,而非王朝或帝国,是欧洲秩序中最基本的结构。在合约中,所有国家都被平等对待,无论瑞典、荷兰等新的大国,还是法国和奥地利等旧有的大国。基辛格强调,这为延续至今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

到20世纪中叶前,这一国际体系已经在每块大陆上都建立起来;这仍然是国际秩序的框架。

基辛格写道,《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或许会被抨击为一种权力操控体系,但实际上还有其它意味——通过建立均势避免一个单一的国家占据主导的努力。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面临的最强有力的早期挑战来自革命的法国。基辛格写道,这场革命表明,社会内部的变化比来自外国的入侵,能够更加深远的撼动国际均势。

秩序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得到恢复。但出现了另一种救世主似的构想。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深信,他能够引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神圣同盟”。

民族主义,1848年的革命、克里米亚战争以及德国统一令欧洲显贵1815年达成的协议并未持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冷战结束后,欧洲努力明确一种独立的身份认同。基辛格担心,欧洲大陆对软实力的追求可能已经结束,由此产生权力失衡,而此时世界的其他地区正在追求硬实力。他认为,欧洲正不自在地悬于其想战胜的过去以及其尚未明确的未来之间。基辛格总结道,但即便欧洲在寻求一种新的秩序,欧洲已经发展为这样一种社会,这个社会由值得赞美的目标联合在一起。

与美国的对比简直不能再明显了。美国融合了已经建立起来的机制的不信任

感与十字军东征的精神。

尽管美国拥有理想主义,然而,美国仍面临十分不同的世界秩序观点。共产主义与第三世界对美国的信条构成了直接的挑战。基辛格提出了他认为华盛顿所面临的数个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有开头和结尾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有条理的过程么?有最终的目标么?还是说美国的政策只是一个应对不断出现的挑战的过程?基辛格显然倾向于后者,这对于那些熟悉其履历和著作的人们而言,并非意料之外。

正因为这种对待国际关系的方式,基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面临猛烈的抨击。但其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所广泛散布的观点,即基辛格正试图让美国衰落,而非加强美国的实力,是虚构的。事实上,他努力应对一个可怕的新现状,那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混乱局面。当时美国从越南脱身,面对士气高涨的苏联,更不必说由决心与莫斯科和解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引领的西欧,美国需要喘息的空间。

基辛格提醒我们,1971年,尼克松告诉《时代》周刊的编辑们称,大国之间有必要拥有相互交叠的一系列目标。他说,我认为,如果我们拥有一个强大、健康的美国、欧洲、苏联、中国、日本,相互平衡,不彼此对抗,就将有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美好的世界。

这种观点构成了一种道德主义——关系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基辛格呼吁“这样一种秩序的理念,这种理念高于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观点及理想。在历史的这个时候,这将是融入当代现状的现代化了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体系”。

这是否真的能够实现显然是值得怀疑的。

但作为理解国际事务的一种方式——以及维持权力与理想主义之间微妙的平衡的一种方式——基辛格的箴言无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宝贵。

基辛格的见解将有助于形成一个比目前的这个时代更加安宁的时代。他本人以谦逊的口吻结束这本著作称,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十分傲慢”,以至于他认为自己能够对“历史的意义”发表意见。他写道:“我现在知道,历史的意义是要去被发现的,而不是去被昭示的。”如果他的建议遭到忽视,那将是十分遗憾的。(殷夏译)

媒体评介:日本外交学者网站9月23日发表阿基莱什·皮拉拉马里的书评文章《基辛格是对的:“亚洲”是一种西方结构》如下:

阿米塔伊·埃齐奥尼在外交学者网站上发表对亨利·基辛格新书《世界秩序》的评论,提到了基辛格的观点——亚洲概念是一种西方结构。这一观点似乎在评论界引发了争论,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就个人而言,我一直不满意亚洲的定义,因为仔细研究一下亚洲的历史文化,就会发现按照传统的定义,亚洲仅是对向东欧延伸的一部分欧亚大陆的统称。从历史角度而言,认为欧洲和亚洲是不同“大陆”的看法源自于古希腊的观点,即希腊以东的陆地构成了一个单一有机整体,被称为亚洲,而希腊以西的陆地构成了另一个整体,名为欧洲。这种观点最终让现代西方将欧洲和亚洲作为两个独立的大陆来看待。

从地理和文化方面来说,将亚洲视为一个独立大陆的观点是错误的。就地理上而言,欧洲与亚洲没有特殊的差别;它们一块位于同一地质板块——欧亚板块。此外,一直以来被视为欧亚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并不突出,无法阻挡人口的迁移。位于另一构造板块的南亚被极为令人生畏的喜马拉雅山所分隔。事实上,相较于欧洲,南亚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在自然属性上的差异更为明显。

在文化上,亚洲也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除了将非西方文化与西方相区别的方式,还有其他方式定义亚洲吗?西方已被清楚界定——简而言之,它是一种文明,而且源自于罗马文明,被基督教化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发展。但什么是亚洲?它拥有多种多样的文化,如日本文化和阿拉伯文化,而且与欧洲的情况相比,亚洲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异更大。事实上,可以肯定的是,由于相关的宗教根源,伊斯兰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更接近于西方,而非中国。但这并不是说亚洲就没有共同的历史或文化;亚洲拥有众多区域,比如东亚(如日本和韩国等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或南亚,每一个区域都像欧洲一样独特。当然,在文明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互作用,因此可以将欧洲与亚洲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分区而内在相连的体系。

事实上,重要的是不要过于忧虑地区或大陆的确切定义,因为这样做经常会产生心理困扰,以至于模糊现实而非澄清事实。几十年前,泛亚团结或兄弟关系的理念曾在亚洲很多地区受欢迎,但这是亚洲内化成一个西方结构的结果。举例而言,这导致印度产生了一些想法,即印度和中国的利益或思想模式是相似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那么,就文化而言,是否有一种特定的亚洲文化可为亚洲作为一个文化大陆存在提供合理性?答案是否定的。举例而言,西方人——其中包括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普遍将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一同视为某种“东方”文明的代表。但这极大地曲解了印中文明以及西方文明。较为正确的假设是,尽管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有某些共性,但它还包含着同等数量的西方文明元素,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领域,如哲学前提。因此,欧亚的各种文明彼此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不应将其揉成一团。这并不是要模糊一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具有更多共性的事实。南亚问题

观察家都知道,尽管东南亚和东亚受佛教影响的时间较长,但南亚在文化上(遗传基因上)更接近于中东地区,而非东亚和东南亚。

审视欧洲和亚洲(以及非洲)的一种较为正确的方式是从地理上将它们视为单一大陆板块的一部分。然而,由于该大陆板块的主要差异是文化和文明上的,有关其概念性术语应当反映这一事实。因此,它要么可划分为包括欧洲在内的几块大陆,要么可划分为欧洲等几大区域。不同的划分方式可以凸显文明(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说,西方、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等等)或相交地带(如地中海)。但概括亚洲最简洁的方式是将其定义为一个(包括欧洲在内的)自然大陆,拥有约7大区域。这种方式平衡了地理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且未完全遵循政治界线划分而是包含了几大过渡地带:欧洲、中东(包括北非在内)、南亚、中亚、俄罗斯、东亚和东南亚。

我并不反对使用亚洲一词作为描述某些区域的临时用语,尤其是欧亚大陆板块靠太平洋的东部地区。但我认为亚洲不可作为一个整体涵盖所有的地理或文化内涵。我更愿意看到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具有不同区域的大陆板块——欧亚板块,这就不会模糊这些地区拥有大量共同的文化、历史和发展趋势的事实。(邹眉译)

作者解读:英国《独立报》网站9月27日发表迈克尔·哈利伯顿的访谈文章《亨利·基辛格的世界秩序:可能性的外缘》如下:

1971年7月,亨利·基辛格在伊斯兰堡搭乘一架小飞机,短暂从地图上消失。此后几天的官方报道说,他病了,但其实,尼克松总统的这位得力助手却踏上了前往北京的震惊世界的秘密旅程。这一时期,美国正在不断重新定义可能的事情。

仅仅两年前,它就实现了第一次载人登月。虽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实际挑战与此不太具有可比性,但在政治上,这却令人感觉等同于穿越平流层。

关于世界的危险倾向,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我们见面——在 43 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自己在谈论美中两国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基辛格在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中所构建的微妙外交架构,看起来越来越受到威胁。在他的新书《世界秩序》中,他引用了哈佛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在巧个案例当中有 10 例,当存在一个地位稳固的大国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时,战争便随之而来。我问他,他认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加以避免。

“无论是奥巴马总统,还是习主席——特别是习主席——都表示,他们希望,中美关系会展示,在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和一个现有大国之间,如何实际遣散关系的紧张。”他用咕噜咕噜的独特而阴郁的咽喉声回答说:“不过话说回来,他们一直无法给它一个实用的表述。而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在谈到中国南海岛屿上的暗流涌动的紧张局势时,他说,“迟早其中之一会导致对抗。我不希望中国和美国像 1914 年的德国和英国那样,但我不认为我们主要通过沿中国边境进行军事部署就能加以抵制。因此问题是:我们能否创造我们自己和中国之间的空间……即美国的军事存在展现在地平线上,但我们可以按照一些既定的规则进行竞争?”

9 月份晴朗的一天在纽约蔚蓝色的天空下,我们在基辛格同仁公司——基辛格与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合办的国际咨询公司——的办公室里见面。斯考克罗夫特也是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尽管基辛格已经 91 岁高龄,并正处于最近的心脏瓣膜手术的恢复期,他的办公室里给人铺天盖地的印象却是青春的气息,漂亮的年

轻男女谨慎地进出不同的门。基辛格曾如此议论毛泽东：“他的素质决定，他站在任何地方，都会成为中心。”对于这一特点，他深感钦佩，并在自己身上加以培养。尽管他是自己办公室里身材最矮小的人，现在还拄着拐杖，但当他走来迎接并审视我的时候，权力的光环是不容置疑的。他的眼睛一眨一眨，犹如红衣主教黎塞留和欧洲鹰鸽之间的交叉。

对全世界的政治家来说，基辛格的持久磁场几乎肯定可以追溯到他成功地为美国总统争取到会见毛泽东的邀请。这次会晤标志着他从高层政治家崛起为国际巨擘，成为他那个时代最晶莹剔透的分裂性人物之一。他在书中的一处宣称，政治家“必须在可能的事情的外缘上采取行动，跨越自己社会的经验和愿望之间的鸿沟”。

纵观基辛格的一生，这一直是他在其中蓬勃发展的概念天地。无论是在接近中国，在实现与俄罗斯的缓和，还是在扭转埃及和以色列之间 1973 年的敌对行动方面，他那平衡人物复杂的个性和将相互冲突的文化编织到一起的能力，都是以一种直觉的天赋施展，用他土生土长的德国话来说，就是“指尖的感触”。

对他在政治战线上的持续不断的效力的最好证明就是，在我们见面前不久，希拉里·克林顿对他的这本书发表了有些异乎寻常的——但却抱有适当热情的——评论。他的回报是表示，尽管他持有共和党观点，但他相信她会成为一位出色的总统。我问道，作为国务卿，她都表现出什么样的素质，使他相信这一点？

他微笑着说：“她对国务院作为一个机构的管理要比我所曾见到的都好——包括在我自己领导下。我不像她那样一丝不苟。她是在一个复杂的时刻，作为想要进行大幅度改革的一届政府成员上任的。在这些问题上，她自己的看法并不像现任总统那样要求大规模改革。她处理各种关系显示出了很大技能，我也从未听她

说过一句批评总统的话。我将会支持共和多功能候选人,因为我认为我们需要变革。我也公开说过这种话,但我对她的看法是十分积极的。”

他的这番言论的伸缩性具有典型的基辛格特色。除了包含对奥巴马的绝非过于微妙的旁敲侧击之外,这番话在宣布支持克林顿问题上模棱两可,这样一来就可以按照政治局势的任何风向加以调整。基辛格个性的这种变色龙方面经常受到人们的评论——基辛格究竟是何许人,这个问题一直是与他密切打交道的许多人所挥之不去的。

在这一光谱的最惊人的一端,他一直是一个性生活方面的不大像样的象征。他经常与包括伊丽莎白·泰勒、拉奎尔·韦尔奇、丽莎·明妮莉,以及很长时间以后的戴安娜王妃等女性一起拍照——近年来与他一起合影的美艳女性还有卡拉·布吕尼。1972年,就是尼克松本人前往中国那一年,基辛格甚至在《哈佛讽刺》的一期上作为一个斜靠着裸体出现,这一期哈佛校刊后来卖了110万多本。当有人把一本拿给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看的时候,他让人将其贴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

但是,不仅引起他的盟友,而且引起他的低毁者的最多评论的则是基辛格比较微妙的化身。他在“可能性的外源”上工作的能力被人们与他把世界看作一系列不断变迁的现实的倾向联系到一起。这一直不仅作为他的天才的精髓,而且作为一项性格缺陷而引起争论。已故的国际关系专家汉斯·摩根索曾经是基辛格的老师。他曾经评论基辛格说,他是“一个广食性动物、一个多面的人物”。弗兰克·莎士比亚曾在尼克松执政期间担任美国新闻署署长。他的话更为直截了当:“基辛格能够与6个不同的人会面,他们全都十分精明,博学多闻,经验丰富,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然后说服所有6个人,使之相信,真正的基辛格就是站在他们面前的

这位。”

要了解基辛格如何看待自己,研究一下他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所提到的历史上的英雄是有帮助的。他在采访期间对我说:“你越是靠近可能性的外缘,就越冒风险,因为你是单枪匹马。”因此,基辛格感到孤单的时候都想到什么人?红衣主教黎塞留(路易十三的得力助手)、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富于领导魅力的首相)和奥托·冯·律斯麦(德国传奇式的统一者)。他们全都因为狡诈和野心而遭到嘲笑,但却全都能够取得辉煌的最终改善了世界安全的概念性飞跃。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对法国外交家塔列朗的描述——此人被一些人视为类似于马基雅弗利主义权谋的体现。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塔列朗就一再倒戈,以确保自己留在权力的内圈。基辛格说:“他作为主教开始自己的事业,离开教会去支持革命,放弃了革命去担任拿破仑的外交部长,放弃了拿破仑去就恢复法国君主制进行谈判,然后作为路易十八的外交大臣出现在维也纳。许多人把塔列朗称为机会主义者。塔列朗本来会争论说,他的目标是法国境内的稳定和欧洲的和平,他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实现这些目标。”

当然,随着普京用其致命的现实政治刺激西方,中东和非洲的许多国家见证了伊斯兰圣战的泛滥,中国进入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炫耀武力阶段,西方肯定需要某个具有塔列朗才能的人。而基辛格这位20世纪主要的现实政治倡导者则乐于使人如愿以偿。《世界秩序》一书是对他的毕生信念的富于激情的阐述。他相信,秩序和自由是相互依赖的,建立长期的平衡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做出受选民欢迎的让步的短期好处。对此他毫无歉意——曾经有一次,在论释歌德的时候,他说:“如果一方面我必须在正义和无序之间做出选择,另一方面又在非正义和秩序之间做出选

择,那么我始终都会选择后者。”

可以肯定,他的观点由于其可以与今天外交界的大多数主要参与者相媲美的历史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而内容丰富。以他对俄罗斯的策略为例。从17世纪到20世纪中叶,俄罗斯一直被证明在维护世界的力量平衡方面至关重要——它使瑞典的查理十二、拿破仑和希特勒的扩张主义梦想破灭。这对于基辛格有关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判断是至为重要的。

他宣称:“我不同意普京的意见。但为什么在此过程中没有某个人建议采取本来会消除双方在独立的乌克兰背景下的担忧的解决办法?当欧洲表示乌克兰必须在—项商业谈判中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也许)做出相反表示,表示让我们一起干,本来可能会取得重大进展。”

他接着说:“妖魔化普京是很容易的。当然,他并非是容易打击的目标,但人们必须认识到以前的这种类型的俄罗斯领导人——而且他并非希特勒。人们应当从一位俄罗斯领导人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问题是,人们为什么在亚洲正在实现自我改造、伊斯兰世界处于长期动乱之中的时刻设想俄罗斯与西方的长期关系?”

世界秩序的最初基石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缔结的时候奠定的——这是在1648年,即30年战争结束时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十分重要的是,基辛格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反映了对现实的切合实际的让步,而不是一种独特的道德见解。”在这一体制下,国家变成全球秩序的根本基石——一种不会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但却准备“通过力量的总平衡”遏制其野心的独立实体。

虽然一部部完整的著作对基辛格与具有可疑的人权纪录的政权和派别进行谈判、以维护自己的全球平衡意识的愿望进行了指责,但他却阐明,他感到自己始终选择了两种邪恶当中较小的一种。他对我说:“我之所以关心人权,是因为

我曾经生活在对人权的极端侵犯状况下(在纳粹德国),但当我就人权发表评论的时候,我是作为外交政策的实践者这样做的。我一般会争论说,应当与一个国家建立充分重要的关系,以使之利益攸关,然后利用这种关系来减轻对人权的侵犯。”

可以肯定,“阿拉伯之春”就在人民的欢呼雀跃之下发生了,患有虐待狂的压迫性领导人被推翻之后实现公平治理的最佳途径受到质疑,因为这种变化的唯一结果就是各国被教派战争所吞噬。基辛格说:“利比亚是一场灾难。几乎可以肯定,所造成的生命的损失要比卡扎菲统治下多——这是一种可怕的结局。”我对他说,卡扎菲当政时期我曾在利比亚旅行,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发现,我夜间在的黎波里外出感到要比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安全。他直勾勾地看着我,知情地点点头。他严肃地说:“你说这话的时候,喉咙梗塞。”

在奥巴马总统发动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空袭之前,他大力主张有必要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但他“确信我们能够击败该组织目前的表现。伊朗则要复杂得多”。我向他表示,如果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被拉夫桑贾尼这样比较温和的领导人所取代,就可能使威胁得到减轻。他摇了摇头。“如果伊朗研制出核武器,或者接近于研制出核武器,单单这一事实就会改变该地区的力量平衡,无论政府最终可能被证明是多么温和。因为这意味着,伊朗蔑视安理会,并最终在与美国的一场充满威胁的冲突中获胜。”

人们警告我不要再与基辛格提起敏感话题。但他却是既具有魅力,又滔滔不绝。因此我问,对于在越南的长期冲突以及秘密轰炸中立的柬埔寨,他是否感到有任何遗憾。他把头低下,喃喃地说:“有朝一日我会在这一个问题上学会做出很好的回答。”他抬起头来宣称:“(在越南)我们在我们所继承的一场战争中竭尽全力了。”

人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不会屈服于的一项条件就是用一个共产党式的政府取代我们的前任所建立的政府。我做出误判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通过谈判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但是,即使我对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我们本来怎样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采取行动?”

在柬埔寨问题上,他声称,尼克松上台之后几周内,“越南共产党人就开始了每周杀死 400 到 600 名美国人的一场进攻,因此一个月以后,我们在越南的进攻中损失的人数就超过了我们后来在阿富汗的 10 年战争中所损失的人数。其中许多伤亡都是在北越的四个师占领了柬埔寨部分地区之后发生的。没有人曾经表示,在那一地区有过任何伤亡。我几十年来一直忍受着这种情况。我真的不后悔。”

“我唯一遗憾的就是,我们的国内立场不允许我们保持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我在政府任职期间的最悲惨的一天就是从越南撤离的日子。我认为,理查德·尼克松采取了英勇的行动。他每年撤退 15 万美军,他于 1971 年停止了地面作战,他还就此达成了我们真诚地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项协定……但是此时,援助被大幅度削减,美国以现在通过空袭在伊拉克发生的规模重新干预的可能性通过特别的立法被国会所禁止。”

我们一直进行了 90 分钟交谈。在我们周围,漂亮的年轻人开始行动起来,以便让基辛格走下一层楼去会见英国《独立报》的摄影记者。他消失在走廊里,到洗手间去梳洗。我等在接待区,期待他再次出现,没有意识到即将上演的一出小小的戏剧。

看到我在等待,基辛格的助手之一摇摇头说:“他总是通过自己的路线离开办公室。”他引导我进入电梯大堂。这里如同“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一个场景,每侧

有四个电梯入口,其他墙壁每一处都有一扇门。他笑道:“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他会从哪扇门出来。他喜欢让我们不断地猜测。”

有一阵子,我们等待着这位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政治家,就像他的职业生涯中的许多人一样不敢相信他会从什么角度出乎我们的意料。然后突然间,电梯右侧的门洞开了。基辛格具有鲜明特色的身影嵌在门框之中,看到我们的表情,他微笑了。他问道:“我们可以走了吗?”(尹宏毅译)